

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我们要想占据文化制高点,增强国际文化竞争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艺领域,就不能不提出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的问题。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互补

应当正视这样的现象: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落后于我们的社会变革,我们的文艺批评又滞后于我们的文艺创作,而我们的文艺理论呢?比文艺批评还要落后和逊色!

千万不能以为,有了文艺批评、作家论、作品论等,就可以取代或替换文艺理论。二者对象、功效、意义、价值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有见地、有眼界的文艺批评,必须要有一定的文艺理论作基础的;就是作家、艺术家及文艺教育工作者,也要有相当的理论素养才行,否则那层次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的。

文艺理论曾经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的影响。远的不说,鲁迅就曾谈到,他在参加“革命文学”论争时“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科学的文艺理论往往具有思想启迪、补偏救弊的功效,连鲁迅都因此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遑论其他?

文艺理论因此是多么的重要啊!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它就可以取代或替换生机勃勃的文艺批评。二者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能相得益彰。

我们正身处盛世。回想公元460年代,也就是近1600年前的齐梁时期,是算不上什么盛世的,但却诞生了古代中国两部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完全全民都已将文化建设列入增强综合国力重要目标的今天,我们理应痛下决心、埋头苦干,孕育、产生出当代的《诗品》和《文心雕龙》来!

钟嵘和刘勰不尽相同。钟嵘是批评家,他对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相当精当的评论。其眼光之锐利,其见地之独到,真乃批评大家也!而刘勰,则以儒学为根基,辅以道学和玄学,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终于著成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无人出其左右!章学诚曾比较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勤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源别也。”(《文史通义·诗话》)换成今天通俗之言,这两位就是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真正“祖师爷”。相比而言,鲁迅对《文心雕龙》的评价显

重建文艺理论的权威

□朱辉军

然更高一些,他是放在世界范围来看的:“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论诗题记》)

今天我们固然很需要钟嵘及其批评,但同时也要强调:我们更需要刘勰及其理论!

在当今这个社会文化剧烈变革的时代,在文化建设日益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文艺理论建设可以说赶上了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有志于文艺理论探索的人们,应当抓住机遇,潜心研究,争取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也不逊于古人和洋人的文艺理论著作来!

文艺理论的“诗外功夫”

文艺及其理论和批评,并不像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说的,是完全自律的。它们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并反映、体现出社会时代的要求。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和批评家)都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一种极错的看法,认为理论只是书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是继承总结前人的成果上推论出来的。这固然是形成理论所必需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与社会、与生活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不把握时代的脉搏,远离当今人们的心理,即使构想出鸿篇巨制来,也不过是“寻章摘句老雕虫”而已!所以,不仅要求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实践,就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也要深入生活、深入实践。

对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其实面对的是两个实践——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这里先说社会实践,下文再说艺术实践。许多文艺理论家都是亲身投入社会实践,并站在时代前列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辛、歌德、席勒,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等,都深深介入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潮流之中,常常还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佼佼者;就是维科、黑格尔、克罗齐等,也是十分关注社会变化的。正是由于他们站在社会时代潮流之中甚至之前,因此使他们的文艺理论达到了前人所难以达到的高度。马克思当年曾感慨地说道:“莱辛以前德国政治发展迟缓和文学情况凄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所谓‘有资格的作家们’,各守门户,享有特权的专家们、博士们和其他权威人士们,十七八世纪大

学里一些没有性格的作家们,披着浆过的假发,卖弄他们的学问,写作他们的分辨毫发的小论文,就是这些人是站在人民和精神之间,生活和科学之间以及自由和人之间的障碍物。创造我们德国文学的是些‘没有资格的作家们’。在高特雪特和莱辛之中,谁是‘有资格的作家’,谁是‘没有资格的作家’,由你们去选择吧!”(《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第455页)除了“披着浆过的假发”(今天也可以喷发胶了),其他的情形简直与我们今天的状况何其相似!

文艺理论家毕竟是理论工作者,是要将感性的现象概括成理性成果的,是要繁复的事例总结为有普遍意义的条理的。这就要求文艺理论家要拓宽视野,不仅限于文艺领域,而要将眼光放到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天地里去。对作家、艺术家,甚至批评家,可以不做这样的苛求;但倘若也能如此,像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钱锺书等那样,当然就更好。但对文艺理论家,就一定要这样要求!中外文艺理论史上,许多文艺理论家本身就是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即便不是专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都对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一定的造诣。21世纪的文艺理论家,更应有这样的自觉追求。

在当今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首先要掌握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才能找准自己的目标、方位和坐标。在现实中,经济与文化艺术的相互渗透和交织,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演变,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这都要求今天的文艺理论家至少要知道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最新进展。

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并深刻影响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年代里,当代文艺理论家还要适当了解和熟悉自然科学及技术。至少要熟悉基本的网络信息技术吧?否则与网络文化隔膜,那理论是不会有什么新鲜感的,更别提创新了。多媒体艺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在艺术中的广泛运用,新型材料在一些艺术门类中的采用,也都要求文艺理论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炼。

文艺理论的“诗内修炼”

无论如何,文艺理论家毕竟是“文人”,不能像毛泽东当年讥刺的那样“文也不足”,还是要讲究些文笔、文采的。枯燥呆板、僵硬教条,味同嚼蜡,绝不是文艺理论应有的文风。刘勰以及后来的钟嵘、叶燮、梁启超、王国维等,西方的莱辛、歌德、席勒、丹纳等,其思索之周密,其文采之华然,令人读来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文艺理论是可以富有感染力的,既以严密的逻辑,也以充沛的激情,同时辅以优美的文字,文艺理论同样可以深入人心的。

参与艺术实践,可以说是对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专业要求。文艺理论家可以不会亲自作诗、画画、唱歌、跳舞,但他一定要懂得作诗、画画、唱歌、跳舞。就像品酒师不一定会酿酒,品菜员不一定会下厨,但他们往往比酿酒师和厨师的味觉更敏锐,更内行,也更有鉴别力。现在一些从事文艺理论的学者、教授,却连一点基本的艺术感觉都没有。他们的理论,与文艺实践毫无瓜葛,如果让他们像钟嵘一样去品诗,不知会闹出多少笑话来!当然,钟嵘也因将曹操置于下品,将陶潜置于中品,反而将张协置于上品,受后世诟病。不过,这倒不是他的艺术感觉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理论的偏差导致他感觉的错位。可见,即使批评也要有科学的、坚实的文艺理论做基础。

文艺理论,还不要自己缩编成文学理论。固然文学理论在中外都比其他艺术形式的理论远为发达,但在如今这个图像优先、注重视听的审美风尚中,文艺理论要成为真正探讨文学艺术共同规律的基本理论。必要时,应多向艺术倾斜一些。20世纪以来,美术、音乐、电影等领域的理论飞速发展,为文艺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经验、新的结论,值得高度重视。不过,也要注意,不要弄成“文学加艺术”的理论,而是要将文学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并站在更高的程度上加以综合的理论。

当代文艺理论家还要自觉承担起推进文艺理论发展的重命。要不断从现实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借鉴、参考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已有的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说新话,铸新词,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新一代文艺理论体系来。

成就一名真正的文艺理论家其实很不易的。自身要不断探索,不断跋涉,不断攀登;社会各界也要倍加爱护,倍加关心,倍加支持;特别是作家、艺术家要充分理解,充分关注,充分信任。通过内外努力,形成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当代文艺理论取得提高和突破,并重建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可以期待的。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9)

批评的光芒体现在哪里

□高昌

日前,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栏目主持人孟非在提到网络上某些胡乱骂人的怪相时,另一位主持人乐嘉说:“有人只是为了借助骂人来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体现自己的价值。”乐嘉的话当然只是一种反讽,胡乱骂人的酷评者又何尝能够体现出什么“价值”来。批评者有发言的权利,被批评者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乐嘉讽刺的现象,不仅是在网络上存在,在很多媒体刊载的文艺批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文”如此,文艺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批评文字的字里行间,体现的正是批评家自己的品格、修养和立场。而那些胡乱骂人的,也确实应该自我反思一下,为什么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在文化创造和建设中去,却偏偏要采取这种无意伤害别人尊严的手段来引人注意?

关于文艺批评的议论,在当前的各种媒体上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赞赏和鼓励,但更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众声喧哗”。这一方面由于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国民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读者的阅读视野扩大了,对文艺批评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某些文艺批评自身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尤其是那种一味地肉麻吹捧或者一律胡乱捧的所谓文学评论,让人觉得苍白无力,黯淡无光,甚至深恶痛绝。

文学评论不是营销手段,不是讨饭的破碗,不是打手和狗腿子的表演,而是心灵深处放射出的光芒,是遗世独立的灵魂之树。遗憾的是,放眼今日文学评论界,多的是荆棘和杂草,少的正是那珍稀的大树。有时候好不容易看到高处一点点绿叶,仔细一看,却只不过是缠在枯树上的藤。这样的判断,来源于我对当前某些文艺批评尤其是诗歌评论的阅读体验。盘点当下文艺批评的种种乱象,我认为缺少文化自觉,是批评苍白无力、暗淡无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转作风、改文风,是其中的当务之急。

12年前,我在北京举行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研讨会上首次听到费孝通论述文化自觉,感觉精神一振,耳目一新。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当前社会生活的丰富态势,给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百花园里浇花、除草、剪枝、整叶,引领春风,播洒阳光,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文艺批评要做到文化自觉,就要有广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见识,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懂得对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反思,要熟悉自己的批评对象,要有建设性的心态和对他人的理解尊重,要有辨别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能力和智慧,要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要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努力。

文艺批评都用一个腔调说话固然不好,但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则应该是对批评家的共同的基本的要求。文艺批评

的文化自觉,其实也是文艺批评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蜕变。有文化自觉的文艺批评,是善意的,理性的,客观的,“是心灵深处放射出的思想光芒,是遗世独立的灵魂之树”。善意,体现的是批评家的品格;理性,体现的是批评家的修养;客观,体现的是批评家的立场。批评家如果忘掉了这六个字,就意味着同时放弃了批评的品格、修养和立场,就有可能变成波皮牛二或者卖瓜王婆。作家赵丽宏在去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曾经感叹说:“现在的批评实在不令人满意。首先是真正的批评家太少了。真正能潜心阅读作品,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批评家不多。因为现在出版繁荣,每年新出版的作品、新冒出的作家特别多,各种新书发布会、研讨会很多,在这些发布会和研讨会上,批评家们是必然要闪亮登场的。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想听到真实的批评声音,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则因为批评家们要面对的作家作品太多,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真正细读作品,真正去认真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作品本身。二则批评家是出版社、发行商请来的客人,在这样的场合,人家都指望听到好听的话,没有人愿意花钱买批评。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即便批评家想说真话,也难于启齿。”赵丽宏的感叹,的确令人深思。

盲目吹捧的批评风气固然不好,而一味抢棍子的批评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记得前些年曾经流行所谓酷评热,批评者将枪口“勇猛”地对准文化界的定评人物或当红新锐,谁名气大就挖苦谁、讽刺谁甚至妖魔化谁。至于观点是否说错了,枪口是否打歪了,则一概“不关我事”。这种酷评的背后有商业炒作的影子,有哗众取宠的因素,有耐不得寂寞的小算盘,而缺少的则是善意、理性和客观。再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史上最烂”“史上最坏”“史上最俗”之类酷劲十足的所谓评论,其绝对化的判断方式和某些“史上最牛”“史上最好”“史上最美”之类“妩媚”的评论,正是一路货色。因为这里的“最”字都没有实事求是的参照依据,也就都没有任何公信力。这种随意褒贬的评论文字在某些媒体上很神气地轻松登场,博得的是暂时的眼球效应,伤害的却是文艺批评的声誉。古人云:“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论短长。”只要手中有了红包,嘴里就拼命地“褒”;只要心中有了戾气,脚下就使劲儿地“踩”——如此“批评文字”,近年来在某些媒体上仍在招摇过市,不断发声。“捧”和“踩”的评论文字,使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批评的理论价值,受到了很大的歪曲和误解。

有文化自觉的文艺批评并不拒绝严肃和严厉。文艺批评当然要有鲜明的观点,要有直言的胆略,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和战斗力。但这种严肃甚至严厉,播洒的是驱散阴影的阳光,而不是荆棘和蒺藜。批评的光芒体现在哪里?一方面体现在驱散阴影的功效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传递温暖的力量上。一个有活力的批评家,即使不是一个思想者,也必然是一个“思想着”的批评家。要有品位,有担当,有见识,有人文关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说过的这四句话,是我心目中文化自觉状态下的文艺批评的目标。

作家的批评观

坊区红旗大街175号北大荒作家协会。邮政编码:150036,请在信封上注明“北大荒酒征文”。

四、作品择优在《北方文学》等有关报刊上发表。

五、获奖作品在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获奖者每人一本。

征稿及评审时间:
自2012年4月至8月末止,9月底前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评委组成:
由北大荒作家协会邀请著名作家、资深编辑与北大荒酿酒集团相关人士共同组成评审团,名单于活动结束后再集中公布。

奖项设置(共一百一十六名):
特等奖一名:奖金一万元;一等奖二名:奖金五千元;
二等奖三名:奖金三千元;三等奖十名:奖金一千元;
优秀作品奖一百名:颁发纪念品“北大荒珍藏酒”一瓶(价值¥1180.00元),所有获奖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
北方文学杂志社 北大荒作家协会
北大荒酿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国版税之争的转型意义

□钱晓宇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官司、柳亚子为版权与北新书局发生纠纷、林语堂与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的版权争议,鲁迅与林语堂因版税敏感话题在餐桌上近乎交恶……民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以及民间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都可以从这些陈年旧事中归结到一个转型的话题上来,而民国版税之争正是转型事实的聚焦,映射着从知识个体到民间机构所经历的特殊变迁。

知识分子的个体转变

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民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思维及生存方式的大调整。既然走传统科考仕途之路已断,除了执教鞭、领官俸之外,成为自由撰稿者,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汇入民间资本运作大潮自然不可避免。因此,知识分子的个体转变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思想意识的转变,二是身份的转变,而提供转变的原动力正是晚清以降的制度性变更。

必须承认,当年不少书生进入出版界的初衷,更多的是为了传播思想理念。只不过,坚守初衷绝非易事。个体知识分子在身份转变过程中,尤其是从书斋走向市场,进入实业界后,必然经受各方压力,而转变的实质其实还包含了身份的双重甚至多重化。生存、赢利与思想启蒙的矛盾逐渐浮现,为之后撰稿人与书生出身的书局老板之间发生版权纠纷埋下了伏笔。

民间出版团体的生存空间

民间出版机构,作为部分个体知识分子谋生的场所,抑或是他们追求理想的场域,探讨其生存空间很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来说,民国不少民间出版团体是文化同人的聚集阵地。同时,大小错落、创建背景或运作规模不一的各类出版团体还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版图。比如上海出版界,“商务”、“中华”等属于第一阵营的大书局,而“正中书局”(即“集成公司”)则是官方书店的代表。大书局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像“商务”和“中华”两家,在人才争夺、出版计划等方面每每上演着紧张的“拉锯战”——你有《辞源》,我有《辞海》;你出《四部丛刊》,我出《四部备要》……

可想而知,规模较小的民间出版机构要在夹缝中立足是相当不易的。良性竞争可以带来共同发展,但是过于激烈的竞争,会带给机构以及转变身份后的知

识分子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旦市场经济利益成为各方角逐的最终目的,书生式的启蒙理想很容易凋谢成昨日黄花。当然,民间出版团体的生存空间,除了具有先来后到,资本积累的区别,以及无可回避的行内竞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社会体制和时局的变动。军阀势力的进入或撤出严重影响了各个书局的发展走向。

因此,知识个体不同的经营理念、新书业的发展趋势、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和各路政治势力,多重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头绪纷杂的生存空间,而从事此类实业的知识分子们在人格与经营理念上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知识分子版权意识的建立

虽然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实属不易,在市场竞争和政局震荡之间挣扎也委实艰难,但不妨碍从事自由撰稿的其他民国知识分子版权意识的形成。维权之声从寥落稀疏,逐步形成一种常态。只不过,这种觉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首先,版权意识的建立必是基于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出版观。民国知识界的出版观已经走出旧式个人著书立说的单一格局,既有个人生存需要,也汇入开民智、启新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旋律,同社会、文教等事业息息相关。

其次,制度层面的变革也为版权意识逐步成熟打下基础。有学者统计过,近代中国的稿酬制度已经形成。稿酬分为稿费,即论字千字给付;版税,即按照出版发行量来提成;版权买卖,即一次性支付购买整部书稿的酬金。虽然书生谈钱,一向为人所鄙视,随着依靠稿费生存的大批作家的出现,出版发行可能存在的巨大利润空间,使民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除了基本统一的稿酬标准之外,“《大清著作权法》《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中华民国17年(1928年)《著作权法施行细则》”等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相继问世。虽然,不少证据显示,这些法令的执行力度尚有欠缺,但它们的存在确实为民国知识分子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版税意识的建立并不等于维权目的统一。民国维权知识分子与出版社发生版税纠纷的原因各有不同,其画风色彩也相当丰富。

总之,通过考察民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民间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以及著作版权意识的建立,归结到个体身上,人们必然慨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无法退居书斋,抽身游离于现代经济规律和社会新兴体制之外了。

2012年第二期目录

小说	聚眠社(中篇小说) ······ 周末
	金龟虫在凌晨飞起(中篇小说) ······ 葛芳
	我的家在东北(中篇小说) ······ 李来兵